



台北故宫：在文化“细软”中穿越时空



台北故宫博物院坐落在台北市士林区,面积虽小,但收藏的物品却是珍稀国宝中的“细软”,包括北京故宫、沈阳故宫和原热河行宫等处旧藏之精华,以及海内外各界人士捐赠的文物精品,共约60万件。

一道海峡分割了两岸,无数“国宝”也因此被典藏在两家“故宫博物院”内。两个故宫博物院都以清室宫廷收藏为基础,也都将1925年的开院视作诞生的标志来追溯自己的历史。

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北京紫禁城,累金、元、明、清各朝的皇室搜集,聚合了中国历代许多奇珍异宝。1925年,当时的国民政府经过几年对宫内珍藏文物的清理整理,在北京紫禁城建立了故宫博物院。

抗日战争前夕,中国当局做出转移故宫国宝的决定,选择重要文物南迁。抗战全面爆发后,国宝又与南京博物院的馆藏珍品一起分三批踏上西去的旅途。抗战胜利后,南迁文物被由重庆循水路运回南京。

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,国民政府令故宫博物院挑选贵重文物以军舰分批转运台湾。

1962年,台湾当局仿照北京故宫样式设计了这座宫殿式建筑,1965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岁生日,正式落成并命名为中山博物院。至此,运往台湾的珍贵文物才得到一个适当的保存环境。

走在台北故宫的建筑里,不论是展厅还是楼梯,亦或卫生间,丝毫没有“故宫”的感觉,倒觉得是身处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。也许设计者深知在台北建立一座“故宫博物院”本身就缺乏厚重的历史氛围来承载这些“宫廷国宝”,索性就以一种现代化的理念来进行设计。当人们置身在这豪华的现代建筑里,欣赏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中的最宝贵的精品时,仿佛是在历史的时间隧道中穿越。

有人说:北京故宫是“有故宫,没文物”,台北故宫是“有文物,没故宫”。这虽然有些夸张,但它反映了故宫中的瑰宝所经历的战乱和颠沛流离,这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。

镇馆三宝:

肉形石:肉形石,顾名思义,是像肉之石,横看竖看,真的像肉,像东坡肉,像红烧肉。是用不透明的玉髓雕成,色峰纹理全是天然形成。“肉”的肥瘦层次分明、肌理清晰、毛孔宛然,令人叹为观止。

翠玉白菜:“翠玉白菜”以一块半白半绿的翠玉为原料,运用玉材自然分布的色泽,雕琢出一颗几乎乱真的白菜;该物为光绪皇帝瑾妃的陪嫁之物。白菜寓意新娘清清白白;菜叶上还雕有两只螭斯虫,属飞蝗科,俗名“纺织娘”或“蝈蝈儿”,善于高声鸣叫,繁殖力很强,寓意“多子多孙”。可以说这是件别有含义的嫁妆。

西周青铜器毛公鼎:鼎高53.8厘米,半球状深腹,三足皆作兽蹄,一对壮硕的鼎耳。文物界公认此物系西周晚期宣王(公元前827-公元前781年)时的一件重器,鼎腹内铸有32行铭文,共497个字。迄今为止,毛公鼎是铭文最多的重器,为稀世瑰宝。当时的青铜器不但以质地、古旧程度论价,而且还按照铭文的字数加价,相传一个字可以加一两黄金。



访名人故居 与大师对话

台北风景秀美,繁花似锦,却曲径通幽,不少文人墨客、名人大家曾在此落脚定居。随着这些人的西去,他们的故居便成为后人瞻仰参观的好去处。

在台北的文化名人故居参观,一直活跃在人们脑子里的两个字就是“活化”,用我们惯用的词来说似乎就是“开发利用”,但似乎又感到不够,因为一个“活”字给予了那些原本已静寂了的建筑、家具、文献、书籍以“灵魂”,因为一个“活”字使那些大师又与我们在一起。

当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名人故居承载着名人的历史和声誉,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特有魅力,是一个城市引以骄傲的文化资本,因此必须予以保护后,接着的就是要使故居“活化”,只有深挖名人故居其文化内涵,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和认识,让其放射出应有的光芒,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保护。

林语堂故居位于鼓浪屿漳州路,蓝色的标牌上白色的“林语堂”和“故居”之间插着一个红色的像烟斗状的勾,如林语堂先生一样颇有几分幽默。在林语堂故居四合院的左边,原来是车库,现在是一个阅读研讨室。书橱里的书约有两千多册,大多是林语堂先生曾经使用过的,和在书房中的书一样,全部有编号标签,目录储存在电脑中,方便人们查找借阅。

这里经常举办林语堂先生的学术研讨会。每周五下午有讲座,既有阅读方面的,也有科普方面的。每周六,还有读原著学英语的活动,旨在“从阅读林先生的《京华烟云》开始,树立学习英语的正确观念,贴近林语堂的作品世界”。这里还供社会各界有偿使用,召开会议或举办讲座等。

胡适先生的故居位于台北市南港的“中央研究院”内,“胡适纪念馆”的馆标写着胡适名言:“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。”

胡适一生最重视保存资料,其有关档案除早期的现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外,晚年的档案全部集中在胡适纪念馆内,留在美国的部分档案,也由纪念馆陆续要了回来,因此得天独厚地成了全世界收藏胡适相关资料最为完整的纪念馆。

